

重庆古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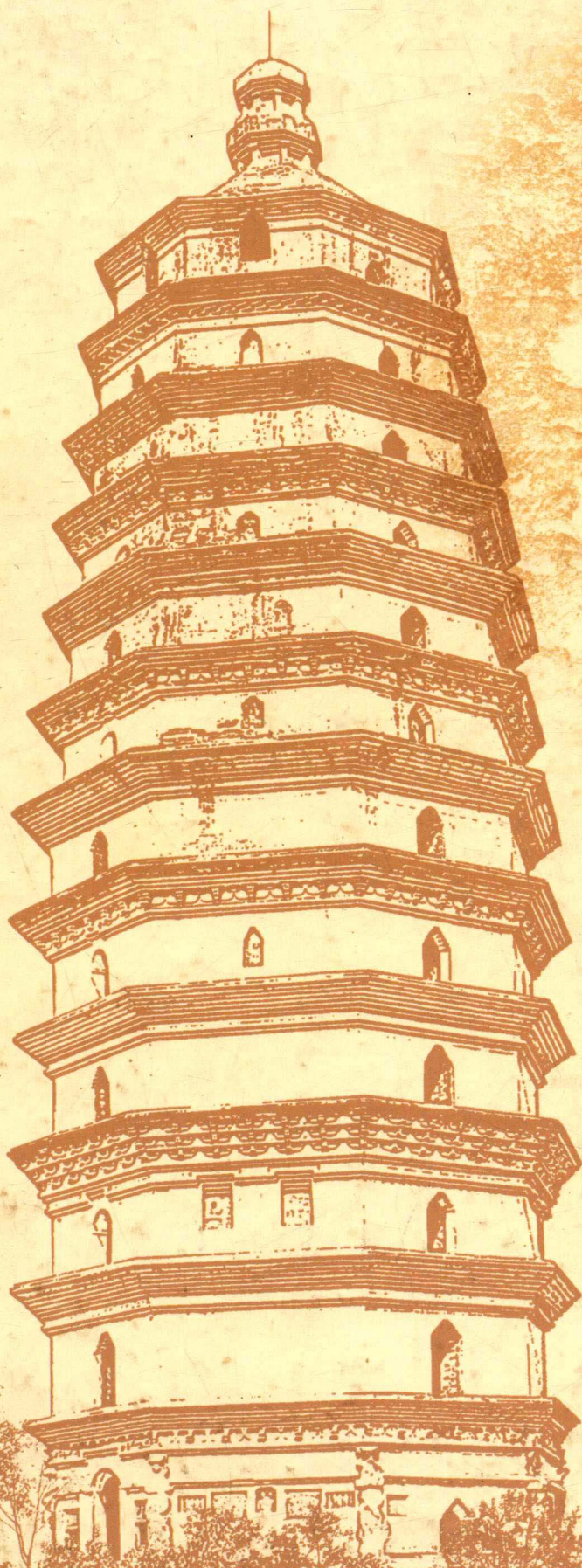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著

科学出版社



重庆文化遗产保护系列丛书



重庆文化遗产保护系列丛书

重庆古塔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首先从功能上对重庆200余座塔进行分类,对每一类塔进行建筑形态特点的总体分析;其次从能够显示重庆古塔特色的细节部分,如平面形状、内部结构、塔身收分、塔檐及塔刹装饰等的变化及特点进行分析;再次对塔身文字装饰进行分析、解读和辑录;最后辅以地方志书中的记载,既能使读者对历史上曾经存在但现在已湮灭的部分塔有所了解,亦可为现存古塔将来的保护维修提供文献支持。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特别是从事古代建筑规划、设计及维修保护等的专业人员,以及相关院校师生阅读与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古塔 /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12
(重庆文化遗产保护系列丛书)
ISBN 978-7-03-038674-8

I. ①重… II. ①重…②重… III. ①古塔—介绍—重庆市
IV. ①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25409号

责任编辑: 宋小军 肖丽娟 / 责任校对: 宣 慧
责任印制: 钱玉芬 / 书籍设计: 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880×1230 1/16

201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1/2

字数: 403 000

定价: 3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重庆文化遗产保护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 任 邹后曦
委 员 白九江 袁东山
方 刚 林必忠
杨小刚 李大地
刘继东

《重庆古塔》编委会

主 编 刘继东
编 委 孙 慧 白 莹
袁 钧 丁韦强
刘远坚

前言 FOREWORD

建筑是一门技术,同时也是一种艺术。中国建筑具有悠久而光辉的历史传统,凝聚了一代代营造者的智慧和心力,从而能够在世界建筑之林中独树一帜,进而影响整个东亚。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丰富,大致有宫殿、衙署、坛庙、陵墓、寺观、园林、塔幢等十余种,构成完整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塔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舶来”的事物,受到中国本土建筑文化的影响,逐渐走出与原产地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发展出不同的地域特色。

重庆古塔是中国古塔中保留浓郁巴渝地域特色的一个重要分支。根据重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全境现存古塔共200余座,年代从南宋延续至民国,涵盖了佛塔、风水塔、字库塔等几大类,从建筑形制来看,有楼阁式塔、仿楼阁式塔、密檐楼阁式塔、喇嘛塔、组合式塔等多种。其中不乏大足多宝塔、荣昌河包报恩塔、江北塔坪寺石塔、合川文峰塔、梁平文峰塔等精品。但是,关于重庆古塔的系统研究开展得少之又少,佛学研究关注的只是其中的佛塔,研究佛塔上的造像、经文等;艺术史研究多侧重于古塔中的石刻造像,注重造像的风格和时代特征等;地方志研究又囿于地域,往往仅记录本地区的重要古塔;建筑史研究多从古塔的建筑形制、结构入手,少有涉及建筑背后的人文因素和文物保护。有鉴于此,本书尝试从历史、建筑、文献、文物保护等多方面入手,对重庆古塔进行综合研究。

《重庆古塔》一书的主体部分包含五章。首先,从功能上对重庆200余座塔进行分类,分为佛塔、风水塔、字库塔及其他四大类。其中佛塔再分为一般佛塔和墓塔,风水塔分为一般风水塔和文峰塔,其他类中既包括功能无法界定的塔也包括雕刻在岩石上的塔,在分类的基础上对每类塔进行建筑形态特点的总体分析和对重要古塔类型举例介绍。其次,从能够显示重庆古塔特色的细节部分,如平面形状、内部结构、塔身收分、塔檐及塔刹装饰等的变化及特点进行分析。第三,对塔身文字装饰进行分析、解读和辑录,辅以地方志书中的记载,既能使人对部分历史上曾经存在但现在已湮没的塔有所了解,也为现存古塔将来的保护维修提供文献支持。最后,对近年来的重庆古塔维修工程进行资料梳理和简要总结,为将来古塔维修提供经验。

在多年的文物保护实践中,我们对重庆的特色文化遗产有一定的资料积累和认识,恰逢刚结束的重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为我们摸清现阶段重庆文化遗产的家底提供了良好契机,于是我们有了对重庆文化遗产做系列专题研究的初步

构想。《重庆古塔》作为“重庆文化遗产保护系列丛书”中先行面世的一本，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我们都在摸索之中。按照计划，我们还将陆续出版重庆碉楼、古桥梁、山寨、传统民居、近现代建筑等相关专题著作，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收集、整理出重庆地区传统建筑的资料，并进行地域传统建筑特色研究，为以后的保护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本书涉及内容较广，时空跨度较大，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其中一些观点，囿于编者学识，难免失之偏颇，敬请方家教正。

著 者

2013年4月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第一章 中国古塔发展简史、分类及研究现状

第一节 中国古塔发展简史.....	/ 2
第二节 中国古塔基本类型、分布.....	/ 6
第三节 中国古塔专题研究文献梳理.....	/ 10

第二章 重庆古塔概述

第一节 重庆古塔现状.....	/ 14
第二节 重庆古塔的文物价值.....	/ 22
第三节 重庆古塔的保护、利用现状.....	/ 25

第三章 重庆现存古塔类型、特征

第一节 重庆古塔分类及建筑形态.....	/ 28
第二节 重庆古塔类型举要.....	/ 35

第四章 重庆古塔的发展演变及形制特点

第一节 平面形状及内部结构的变化.....	/ 116
第二节 塔身收分的变化.....	/ 120
第三节 塔檐的变化.....	/ 124
第四节 塔刹的变化及特点.....	/ 131

第五章 塔身文字装饰及重要古塔题铭辑要

第六章 地方志书中的塔

第一节 地方志书记载的现存古塔.....	/ 156
第二节 地方志书记载的已湮没古塔.....	/ 170

第七章 重庆古塔近年维修工程

第一节 迁移工程.....	/ 176
第二节 修缮工程.....	/ 188

第八章 结语

附表.....	/ 197
---------	-------

参考文献.....	/ 219
-----------	-------

后 记.....	/ 223
----------	-------

第一章

「中国古塔发展简史、分类及研究现状」

第一节 中国古塔发展简史

[1]《魏书·释老》中“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又“魏先建国于玄朔……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此处“浮屠”“浮图”均指佛陀。另“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此处“浮图”“佛图”指佛塔。

[2]嘉祥县武氏祠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发现汉画像石》，《文物》1979年第9期。

[3]张驭寰：《中国佛塔史》，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4]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史籍并无直接记载。《魏书·释老》记“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多数学者认为此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然虽有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但“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魏书·释老》）。到东汉永平八年（65年），明帝“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因以班示诸国中傅”（《后汉书·楚王英传》）。大概西汉末年始有佛教传入中国，但并未传播开来，到

塔起源于古代印度，原本是埋藏、供养佛祖释迦牟尼舍利子的纪念性建筑，其梵语英译名为Stupa，传入中国后，有窣堵波（波）、窣屠婆、塔婆等常见汉语音译名，同时，亦有浮屠、浮图等转译名。《大唐西域记》中有“窣堵波，即旧所谓浮图也”的记载，之所以有此特别注解，大概是因为佛教传入初期，浮屠、浮图、佛图和窣堵波等词是混用的，如《魏书·释老》中浮屠、浮图有时指佛陀，有时指佛塔^[1]。

究其原型，据有关建筑史家、佛学家研究，是一个半球形的覆钵上立着一根刹。1978年山东嘉祥宋山汉墓出土的第三块画像石第二层上（图1-1），有这样一个形象：一个半球形覆钵上立着一棵树，旁边有人对着它呈跪拜状。发掘者认为半球形覆钵是坟堆，画面表现的是春秋时期吴国季札挂剑于徐君墓前的故事^[2]，建筑史专家张驭寰先生认为图中徐君墓的形象即印度传来的“窣屠婆”，从中可看出塔的原始形象^[3]。图中墓冢确实形似覆钵，但就此认为是“窣屠婆”，较难令人信服。

佛塔何时传入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定论，但与佛教的东传分不开却是公认的。随着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4]，佛教建筑也进入中国，过去学术界有人认为东汉明帝建白马寺^[5]供奉佛经，“始有可称佛寺伽蓝者”^[6]。永平求法非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已得学术界公认，明帝修建汉地最早的佛寺也值得怀疑，至于白马寺是否建塔，早期文献亦无半点儿记载。目前有可靠史料记载的汉地最早建寺筑塔活动，是《三国志·吴志·刘繇》所记东汉献帝初年笮融在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一带）兴建浮屠祠。

文献记载，笮融所建浮屠祠“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从四川什邡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佛塔形象，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是楼阁塔样式^[7]。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印度窣堵波与汉地高层楼阁相结合的形式。这些年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塔这种建筑形式传入以前，我国已有高层楼阁式建筑，所谓“仙人好楼居”。至于佛塔传入中国以后，怎样由印度窣堵波样式迅速变成楼阁式塔，则因缺乏这两种样式佛塔的过渡期实物，多数研究成果或语焉不详，或以印度窣堵波传入中国受到本土已有楼阁式建筑影响等语一笔带过。从文献记载来看，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往往与“黄老”^[8]并称，再联系楚王刘英于永平十三年获罪的原因，可见当时尽管佛教已有流传，但其地位并不很高。为了在汉地立稳脚跟，将其崇拜对象窣堵波直接“嫁接”



图 1-1 山东嘉祥宋山汉墓出土的画像石

(嘉祥县武氏祠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发现汉画像石》,《文物》1979年第9期)

于重楼之上,是既能让自印度而来的僧人能够接受的,也是汉地能够容忍的一个折中方案。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则不需要有窄堵坡向楼阁式塔的过渡,这可能也是东汉画像石、北魏石窟中佛塔形象多为楼阁式塔的缘故。

纵观中国塔的发展,从东汉末年笮融筑塔始,大致可以分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汉魏时期。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到有历史记载的东汉末年笮融下邳建塔,其间相隔已是百年有余,虽然缺少相关的文献记载,也没有相关考古发现证明,但寺塔肯定并非仅此一例。

汉魏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汉末、三国大量的译经工作和对佛教教义的宣传、研习,为两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当时佛教发展的盛况,由“南朝四百八十寺”和北魏大力开凿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即可窥见一斑,且作为佛教建筑的塔亦有相当数量。其间虽有北周武帝灭佛,但并未对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整个汉魏几百年间,建塔的高峰期出现在北魏时期,其中为人熟知的如河南洛阳永宁寺塔、河南嵩山嵩岳寺塔、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祖师塔等。仅就《洛阳伽蓝记》^[9]所言,洛阳城中就有各式佛塔近二十座^[10],尤以永宁寺塔规模最大、最为壮观,足见当时建塔风气之盛,可惜今天均已不存。

统观汉魏时期的佛塔建筑,一般位于寺院中心位置,佛殿围绕它们而分布。从造塔的材质来看,主要是木材,其次是石材^[11],还有见于今新疆地区的少量土塔,另有少数砖塔。佛塔平面以方形为主,形制多为多重楼阁式,还有少量方基础窄堵坡^[12]和单层塔,后两者与前者显然不似同一系统之塔。

第二,隋唐时期。经过汉魏数朝的积淀,佛教得到极大的发展。后期虽有北周灭佛,但并未触动根基,相反其在隋代得到极大反弹。隋朝两个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杨坚和杨广都十分信奉佛教,故当时不惜耗费巨资大兴寺院,广建佛塔。尤其在杨坚执政的后期,他对佛教推崇备至,下令广修舍利塔,成为我国修建舍利塔之始。据史料记载,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下令在全国三十州建舍利塔,并举行隆重的仪式,次年又在五十余州造塔^[13],四年再敕令在博、绛等三十余州修塔^[14]。今南京栖霞寺内的舍利塔虽是南唐建筑,但塔基是沿用隋代舍利塔的,原塔就是仁寿年间(601~604年)隋文帝下令所修^[15]。由于后世战乱频发,当时修建的塔几乎都毁于战火,仅能从传世文献和近世出土的建塔碑文中略知一二。目前全国范围内尚存的隋代佛塔,据建

东汉初已经为上层社会接受,确立其地位并正式传播。因此,本书亦认同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两汉之际。至于《四十二章经序》所记东汉明帝因梦求佛,也被佛教界认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但明显附会成分居多,学术界对之也普遍存疑。

[5] 成书于东汉的《四十二章经序》记载明帝“起立塔寺”,但未记载寺名。稍晚成书的《牟子理惑论》根据《四十二章经序》补益,亦未曾提及明帝所建寺名。寺名“白马”是北齐《魏书·释老》才确定的,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6] 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刘叙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和傅熹年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等也采用类似的观点。

[7] 谢志成:《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像》,《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8] 如《后汉书·楚王英传》言“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襄楷传》记汉桓帝“官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9] 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中华书局,2006年。

[10] 张驭寰先生的《古塔实录》(第6页)和《中国佛塔史》(第21页)两书根据范祥雍的《洛阳伽蓝记校注》整理当时洛阳共有佛塔十六座。本书写作过程中,重新检阅范祥雍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和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增补大统寺塔,此塔位于景明寺西,为汝南王元悦所建,砖砌,造于寺东灵台残存基址之上。

[11] 石材营造的佛塔主要见于造像塔和石窟中雕刻的塔。

[12] 新疆喀什诺依城土塔, 见张驭寰《中国佛塔史》, 第6、7页。

[13] 《广弘明集》卷十七(四部丛刊子部《广弘明集三十卷》, 辑上海涵芳楼藏明刊本);《法苑珠林》卷四十(《法苑珠林校注》, 中华书局, 2003年)。关于仁寿元年建塔,《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均记为“三十州”,但在列举州名和造塔之寺时,《广弘明集》所列为三十州,仅陕州未见建塔寺名;《法苑珠林》所列仅二十八州,无陕州和瓜州,且顺序不尽相同。仁寿二年造塔的州数,《广弘明集》所记为“五十一州”,《法苑珠林》则记为“五十三州”。

4 [14]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现代佛学大系》26, 弥勒出版社, 1984年。

[15] 关于栖霞寺舍利塔的建造年代历来存在争议, 20世纪早期日本鸟山喜一《论南京栖霞寺舍利塔浮雕》引常盘大定观点, 认为该塔系隋代所建, 我国历史学家向达在《摄山佛教石刻补记》中也持此观点, 建筑学家刘敦桢在《“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并补注》《覆艾克教授论六朝之塔》中认为其为隋末唐初之物。另外, 关野贞主张中唐说, 伊东忠太、赛棱等人则主张南唐说, 更有主张宋元、明代说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文件中, 将该塔年代定为“五代”。现大多认为塔身系南唐重建, 但塔基还是沿用隋代之物。

筑史专家考察、研究, 只有山东济南四门塔一座, 修建于隋代大业七年(611年), 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隋亡以后, 其继任者唐代的统治阶层继续推行崇佛的政策, 尤其是初期的执政者唐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都笃信佛法, 继之以后的高宗、中宗和睿宗亦崇信佛教。在唐初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支撑下, 这一时期兴建的佛教寺院和佛塔数量激增。不仅中原、关中一带大量建塔, 连当时的边陲如南诏统治下的地区和渤海国的疆域范围都兴建了为数不少的佛塔、佛寺, 保存至今的仍有不少。

唐塔主要有大型塔和小型墓塔两大类, 其中大型塔以砖塔为主, 小型墓塔以石塔为多, 平面以方形最多, 六边形、八边形和圆形的占极少数。大多数砖塔不设基座, 直接自地面开始砌砖。形制以楼阁式、密檐楼阁式(即内部楼阁外部密檐式)为主, 小型塔外观也多做成楼阁式塔的式样。大型砖塔塔身多素面, 少做或不做雕刻, 塔檐多用砖一层层正反叠涩出檐, 有的饰以菱角牙子, 基本不用斗拱一类的结构。小型塔塔身多有装饰, 或雕刻佛像, 或雕刻莲花, 等等。唐塔的内部结构多为空筒式, 其原因是内部原有的木楼层、木塔梯或年久朽烂, 或因火灾而毁, 不复存在, 仅剩下一圈外墙。

唐之后的五代时期, 在佛教寺院、佛塔的修建上没有太多大的成就, 但佛塔上有一些过渡性的变化特征值得注意。如在平面形状方面, 方形减少, 六边形和八边形增多; 在外观装饰方面, 由朴素趋于繁复; 在外观造型和内部结构方面, 也在唐塔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些改变, 等等。总的说来, 这一时期造塔数量锐减, 保存至今的实物也非常少。

第三, 宋辽金元时期。中国佛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世俗化趋势, 到了宋代尤其明显, 一是儒、道、释三家哲学思想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渐融合, 呈现合流的趋势; 二是民间佛教兴起, 信众范围扩大。良好的信众基础, 加上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 使得佛教的发展进入高峰期。在此背景下, 佛教建筑得到进一步发展, 南北方寺院、佛塔林立, 尤其是在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的过程中, 南方佛教建筑更有超过北方的趋势。

正如前文所述, 佛塔建筑在五代时期已有明显变化, 到宋代基本形成定制, 并极大地影响后世。从塔的位置来看, 已由之前的核心位置退居正殿之后或者两侧, 甚至有的建在寺院外围。塔的平面多为八边形和六边形, 方形塔极少。材质方面, 以砖塔、砖木塔和石塔居多, 另有少量琉璃塔、铁塔等。形制上, 宋塔在楼阁式、密檐楼阁式的基础上, 发展了造像塔、宝篋印塔、无缝塔等多种形制, 这些塔一般是实心的。从外观来看, 大多数大型塔塔身装饰都极尽繁复之能事, 除了雕刻部分极力模仿木结构建筑外, 多数塔身每一层还有外挑的游廊, 有腰檐、平座、飞檐等建筑构件, 多用斗拱。内部结构, 宋塔在唐塔的基础上, 发展了多种新的结构形式, 如回廊式、壁内折上式、穿心式、错角式等, 但在塔身上下收分方面, 宋塔不似唐塔的曲线柔和。

这一时期, 与宋并行时间最长的北方政权辽, 其统治者崇尚汉文化, 大多信奉佛教, 也修建不少佛塔。辽塔大多为密檐实心砖石塔, 平面多为八边形, 基座的雕饰

十分繁复，与唐塔、宋塔均不同，往往雕刻出精美的佛教造像，基座及塔身均做成仿木结构，雕刻工艺精湛。门窗形状不似唐、宋塔的方形、圭形，而是多以券形门窗出现。继辽之后入主北方的政权是金，统治时间不长，其统治者虽也好习汉地文化、崇信佛法，但在佛教建筑上几乎没有大的建树，传世的佛塔也极少。

元代统治者大多信奉佛教，上流社会中流行藏传密宗，因此也兴建了不少佛教建筑。这一时期的佛塔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是覆钵式塔，一种是金刚宝座塔。整个元代兴建的名塔不多，所以元塔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小。

第四，明清时期。元代时，藏传佛教成为主流信仰，汉传佛教各宗不同程度地受到抑制。到了明清两代，封建制度逐步走向没落，但封建思想的控制却大有加强之势，其突出表现就是儒家思想得以加强，并逐步走向极端专制，与此同时佛教的历史地位一再滑落，佛教的发展一度趋于停滞，世俗化的趋势愈加明显。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比如反映在佛塔建筑上，这一时期的佛塔在形制上基本沿袭宋塔和辽塔，例如砖塔对木构的精致模仿犹如宋塔，塔内结构也基本如宋塔，又仿辽塔普遍砌出基座，且对基座加以细致装饰，雕刻题材除佛教故事外，还有一些传统民间故事或戏剧故事。从建筑艺术和技术上看，明清佛塔创新不多，并无重大成就。但就数量而言，佛塔建筑众多，形制种类齐全，历史上的楼阁式、密檐式、密檐楼阁式、覆钵式、金刚宝座式、无缝式塔等多种形式在这一时期均能寻到实物，从这一层面来看，明清佛塔又是集大成者。

明清佛塔中有一类是墓塔^[16]，俗称和尚坟，一般体量较小，全是实心塔。从塔身形制来看，明清墓塔主要有仿楼阁式、仿密檐式、无缝式、覆钵式（喇嘛塔）、经幢式等。筑塔材料多选用石材，砖塔和其他材料的塔较少。塔身装饰比较简单，常见的是浮雕佛像或佛教故事、莲花纹等。大体看来，墓塔不似其他佛塔，它们在造型、建筑艺术方面有较大灵活性。

除了佛塔之外，由于风水理论的兴起，明代开始出现风水塔这一新兴类型的塔，尤其是在南方地区。一种是为弥补所谓的风水缺陷而建，民间赋予其镇山、镇水、镇邪、镇妖等意义，一般修在水口、山巅，多成为一地的标志性建筑，起到点缀河山的作用。另一种是各州县主政者为了改善本地风水而按堪舆家的指点在辖域内特定位置修建一座或数座塔，以期启文运、扬文气，多以文峰塔、文笔塔等命名之。风水塔的形制多半模仿佛塔，甚至有的文峰塔塔身也雕刻佛像，内部结构也大致如佛塔。风水塔的兴起，掀起了明清建塔的高潮。

总体来看，无论是佛塔还是风水塔，明清两代的塔以砖塔为主，其主要原因是明代制砖业开始发达起来，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在木材和石材丰富的地域，多见砖木或砖石混合塔。塔平面以八边形、六边形为主，少量为四边形，大型塔多数采用八边形。

[16] 关于墓塔的归类，有学者将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分类，如张驭寰《古塔实录》一书的分类。本文将它作为佛塔中的一个子类。

第二节 中国古塔基本类型、分布

一 基本类型

[17] W.Perceval Yetts. Writings on Chinese Architecture. 汉译文,《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期。

[18] 刘敦桢:《中国之塔》,《刘敦桢全集》(第四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79页。

[19] 叶慈在《论中国建筑》(汉译文,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期)中认为,“中国之塔,共为两种。一种称‘台’,此种塔为数最多,高约三百尺,国君往往浪费金钱以为塔之装饰,人民不免报怨也。另一种为‘楼’,除书籍记述外,可考者为汉代之瓦塔,二千年来建筑之原则。”

在中国学者对古塔开展研究之前,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已经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例如德国汉学家鲍希曼(Dr. Ernst Boerschmann)于1906~1909年来华考察中国建筑及中国建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游遍14省,著书数册,其中包括两卷论及中国庙宇建筑的《中国之建筑》(Chinese Architecture)及致力更深的《中国建筑学文库》(其中有专论古塔),向西方系统介绍了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古塔^[17],对中国塔的形式进行了分类^[18]。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叶慈(W. Perceval Yetts)也是较早研究中国建筑史的西方学者之一,他也提出自己对中国塔的分类^[19]。

日本学者以伊东忠太、关野贞、伊藤清照、鸟居龙藏、常盘大定、村田治郎等人对中国建筑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最有影响力。其成果有大量的实地考察报告,也有专题研究,如常盘大定与关野贞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评解》(第5辑,1925~1929年)、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1925年,陈清泉译本《中国建筑史》(1937年)]、《东洋建筑的研究》(1936年)、关野贞《大陆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1940年)等。这些著作虽不是中国古塔的专题研究,但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例如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有相当篇幅论及中国塔的源流、发展(图1-2),但该书只研究至隋代,对塔的分类亦不够明确和开宗明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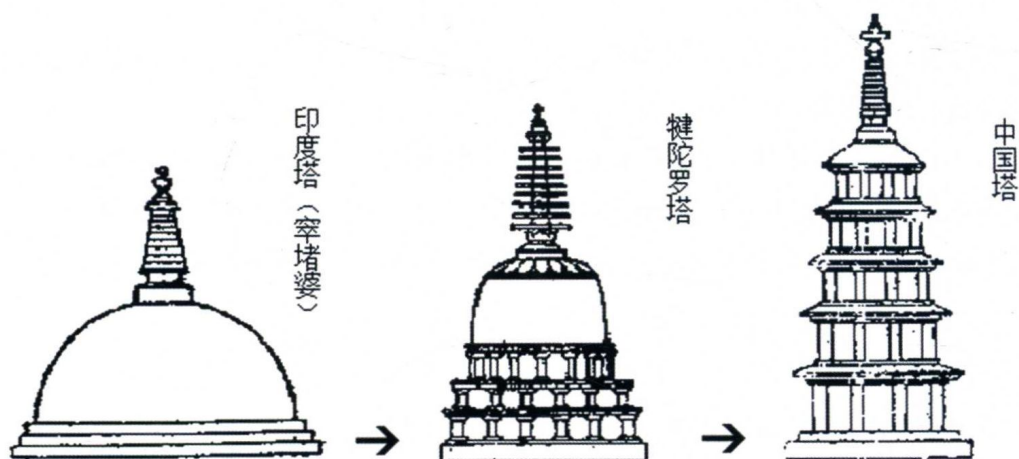


图1-2 伊东忠太：中国塔源流、演变示意

(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陈清泉译补,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第123页)

中国学者对古塔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梁思成、刘敦桢等建筑史学家为主要成员的中国营造学社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开展古建筑调查,以实物和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开启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对中国古塔的研究就是在此过程中开始的。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人在此阶段至抗战期间,撰写过不少古塔调查报告、研究论文^[20],尤以梁思成著述颇丰。这一时期的成果以基础资料的汇集、建筑学上的初步分析和古塔个案的研究为主,但也开始研究中国古塔源流、演变、类型分析等,如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1944年)即用了大量篇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古塔进行举要、分类并分析其细部特征、演变。稍晚成书的刘敦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966年)对从南北朝起的每个历史阶段的古塔都辟专门章节进行讨论,深入分析其类型、特点、承继关系等。

在梁思成、刘敦桢这里已经大致完成对中国古塔基本类型的确认,这也是至今研究中国古塔的学者基本沿用的。后来罗哲文、张驭寰等人都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发展。梁思成先生的分类法是将中国古塔按形制分为单层塔、多层塔、密檐塔、瓶形塔和金刚宝座塔,每一类型中以若干古塔为实例,建立年代标尺(图1-3)。梁先生将中国佛塔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北魏至唐为古拙时期(archaic period),五代至宋为发展时期(elaboration period),元明清为嬗变时期(variety period)。

如图1-3中所示,单层塔在北魏时已产生,多为砖、石塔,平面多为方形,唐代时发展出八角形单层塔,但一直以方形为主流,元代以后单层塔较少见。高僧墓塔多采用单层塔的形式。多层塔主要是受中土“重楼”影响,贯穿了整个古塔史,多是模仿木构的砖、石塔,层数都为单数。隋唐、五代的多层塔平面多为方形,五代以后多为六角或八角塔。唐代中后期多层塔发展出两种式样,一为无柱式,一为仿木构式,两种形式均一直流传至明清。密檐塔又被梁先生称为单层多檐塔,现存最早的实物是河南嵩岳寺十二角砖塔,此类塔下层塔身比较瘦高,其上密檐多层,檐部或叠涩或刻椽、瓦等仿木构件。除嵩岳寺塔外,早期密檐塔都为方形,五代时期发展出八角形塔,但方形密檐塔直至清代仍然存在。瓶形塔在形制上更多地承继了印度窣堵坡的造型,元代时随着喇嘛教的兴盛而开始大规模流行,但山西佛光寺的唐代志远禅师塔已略具雏形,明清两代亦有修建。金刚宝座塔在中国现存的数量较少,图中选取房山云居寺南塔、正定广惠寺华塔、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碧云寺金刚宝座塔作为标本,中间缺环较多,难以看到其完整的发展脉络。

刘敦桢先生对中国古塔建筑形制上的分类法与梁思成先生相同,只是名称略有差异,他将单层塔定名为单檐塔,多层塔命名为楼阁式塔,瓶形塔命名为喇嘛塔^[21],且他对每一类型古塔的总体特征、源流、发展脉络都有归纳、整理。但在一些具体实例的归类上,两人之间存在分歧,如梁氏将房山云居寺南塔和正定广惠寺华塔归入金刚宝座塔,但刘氏则认为这两座塔虽是五塔组合的形式,但塔下均无高台,不能归于此类,最早的真正金刚宝座塔当属明成化九年(1473年)建成的北京大正觉寺塔。

[20] 这些论文大部分收录于《梁思成全集》和《刘敦桢全集》。

[21] 刘敦桢:《中国之塔(在中国建筑师学会上的讲演稿)》,《刘敦桢文集》(第四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

歷代佛塔型類演變圖

各圖非用同一縮尺 NOT DRAWN TO SAME SCALE
 附畫人像以平塔略略大小 HUMAN FIGURE INDICATES APPROXIMATE SCALE
 各塔地平線位表示在紀年尺中相當之年代

EVOLUTION OF TYPES OF THE BUDDHIST PAGODA

POSITION OF GROUND-LINE INDICATES DATE IN RELATION TO CHRONOLOGICAL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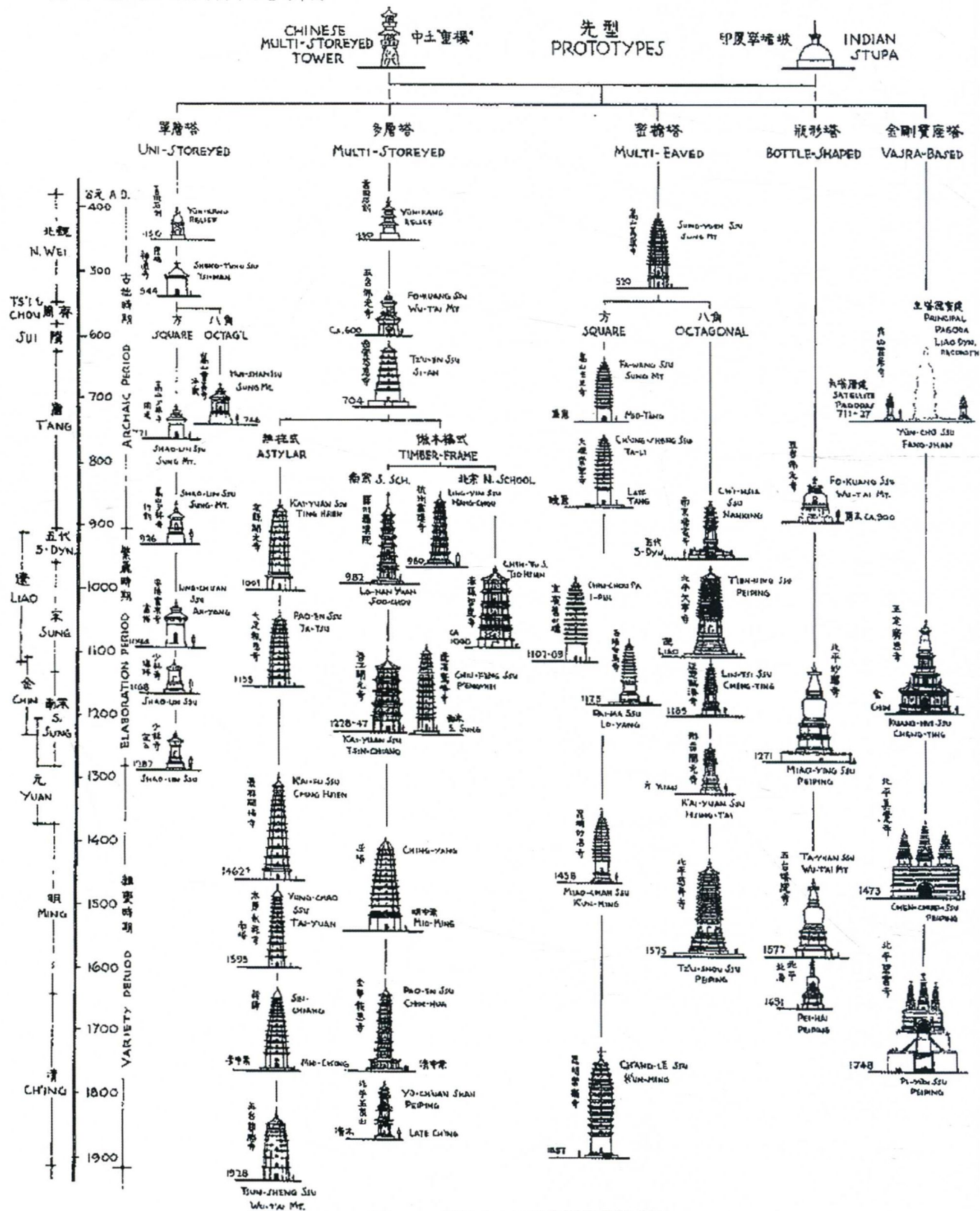


图 1-3 梁思成：历代佛塔型类演变图

(《梁思成全集》第四卷, 第221页)

二 大致分布

迄今，中国现存古塔数量有几何，暂时尚无法完全统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之后应可以有确切数据，奈何现今成果尚未全部公布，故不得而知。因此在此只能讨论其大致分布范围。

从形制来看，上述梁、刘二位先生所分出的五种基本类型的塔，其中单檐塔和楼阁式塔的分布比较广，几乎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但仍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例如同样是楼阁式塔，北方塔不用木檐装饰，但南方塔尤其是江浙一带的楼阁塔则会使用木檐装饰。其他的三种类型塔则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例如密檐塔主要分布在东北、内蒙古自治区中东部、京津地区、河北、山西北部，基本属于辽统治范围内，另外在陕西、河南有比较集中的分布，四川、云南也有少量。喇嘛塔则集中分布于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北京、云南、四川等地，山西、辽宁等地有少量分布。金刚宝座塔现存数量屈指可数，北京有4座，甘肃2座，山西、河北、内蒙古、湖北、云南、四川各有1座^[22]。

以古塔的功能来看，佛塔在全国基本上都有分布，张驭寰先生甚至认为全国现存塔中有80%以上都是佛塔^[23]。佛塔以外，风水塔则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许多县都修建风水塔，一般位于县城东南或南面，北方地区相对较少，东北和西北地区极少；字库塔也主要分布在南方，尤其集中在四川、重庆地区，贵州、湖北也有少量。

再从年代来分析，现存古塔实物年代居于唐代以前（含唐代）的塔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山东、北京、云南，其他如新疆、甘肃、吉林等地区仅有零星1至2座。唐代以后的一千多年间，两宋、明清是两次建塔高峰期，各处保存下来的宋塔和明清塔数量较多，分布也较广；然而其间较有特色的辽塔和元塔，数量相对较少，分布区域亦不同于宋塔、明清塔的“遍地开花”，其中辽塔多分布在辽宁、河北、内蒙古、北京等地，元塔则主要集中在河南、北京、山西等地。

[22] 郑琦：《中国金刚宝座塔探微》，《华中建筑》2008年第12期，第170~175页。

[23] 张驭寰、罗哲文：《中国古塔精萃》，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页。



第三节 中国古塔专题研究文献梳理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起,专以中国古塔为对象的研究才逐渐多起来,一批研究成果涌现。大致可做以下分类。

第一,针对中国古塔做的总括性论述,如罗哲文《中国古塔》(1985年)、徐伯安《中国塔林漫步》(1989年)、张驭寰《中国塔》(2000年)、《中国佛塔史》(2006年)等,对古塔发展脉络及各历史阶段各种建筑形态的古塔内外结构特征等进行分析、归纳。

第二,针对某地域古塔展开的研究,如李朝真和张锡禄所著的《大理古塔》(1985年)、王大斌与张国栋合著的《山西古塔文化》(1999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广东古塔》(1999年)、薛增起等编著的《北京的塔》(2002年)、赵克礼的《陕西古塔研究》(2007年),以及日本学者冈岛秀隆在陕西、山西、湖北三省调查古塔,写就的《中国古塔踏查记——陕西省的现况》(1992年)、《山西省的古塔——中国佛教文物相关调查报告》(1994年)和《湖北省的古塔》(1996年)等著作成果。近年各院校也涌现了一些地域研究古塔文化的博士学位论文,如同济大学王晓帆《中国西南边境及相关地区南传上座部佛塔研究》(2006年)、陕西师范大学卞建宁《区域建筑文化的历史地理学思考——试论关中地区古塔文化的地域特征及其演变》(2006年)、重庆大学张墨青《巴蜀古塔建筑特色研究》(2009年)、福建师范大学白占微《福建古塔文化研究》(2011年)等,有的已不再局限于行政区划所限的地域。

第三,针对某一历史时段的古塔,从不同切入点和研究视角开展的讨论和研究,如雷润泽等编著的《西夏佛塔》(1995年)、李宇峰著文《辽宁地区辽代古塔分布与研究》等,另有近年高校部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如同济大学傅岩的《宋代砖塔研究》(2004年)、华南理工大学杨楠的《辽代密檐式塔形制特色研究》(2005年)、同济大学徐永利的《外来密檐塔形态转译及其本土化研究》(2008年)和吉林大学张晓东的《辽代砖塔建筑形制初步研究》(2011年)等。

第四,针对某一类型古塔进行的研究,如张驭寰的《中国风水塔》(2011年)、徐伯安的《我国南传佛教建筑概说》(1993年)、王晓帆的《南传佛教佛塔的类型和演变》(2006年)、郑琦的《中国金刚宝座塔探微》(2008年)、张新莉等的《建筑风水之一——风水塔》(2009年)等。